

尽善

尽美

殿本
精华

故宫博物院 编

紫禁城出版社

1285970



尽善尽美——殿本精华

Perfection: Palace Editions from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淮阴师院图书馆128597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0761号

I. 愈... II. 故... III. 故宮—藏書—研究—中
國—清代 IV. G259.294.9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047-86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坐圓位之者。昔日高騰於覺海。破長夜
之昏衢。徒雲孔駕於性天。棄小乘之仄
徑。因東廣濟於含陵。用以仰報大佛恩。
則此法利之普沾。長与虛空而無盡。古
佛與朕所同歎欵。是為序。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二月初一日滿華



慧日永明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宗鏡錄序

伏以真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爲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俄興。隨照立塵。相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界成差。後則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真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

尽善尽美——殿本精华

Perfection: Palace Editions from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前言

清代由满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建立了大清王朝，统治者以武功统一中国，同时亦以修明文治而彪炳史册。而将中国封建文化推向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文化教育，这一点我们从清宫遗留下来的大量典籍中得以见证。典籍是文化、教育传播的重要工具。清初定鼎北京后，前明皇室遗下的全部珍贵典籍被清宫完好的接收保存下来，与此同时还着手建立清代中央出版印刷机构。

康熙初年武英殿修书处正式成立，专门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武英殿修书处承刻的书，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所刻印的书籍校勘精良，刻工精细，可谓尽善尽美。因其刻印机构设在武英殿，简称『殿本』。

清代宫廷刻书主要以武英殿为主，但就其范围来讲还包括了中央各部以及诗局等隶属内务府管辖的刻书机构，统称为清代内府刻书。清内府刻书入关之前由内三院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承办。入关后，初由前明司礼监经厂承刻，康熙以后则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主，包括中央各部院衙署及苏州、扬州盐运使三织造奉敕设局承刻者等。清代武英殿刻印工匠的技艺是从明代经厂传承下来的，清初许多内府本即有着明显的明代经厂本特征。明代经厂由司礼监掌管，由内廷太监管理并主持其事，他们的学识、才智和水平决定了经厂本的质量较低。清代殿本则不同，是由

皇帝简选全国最有学问的硕学鸿儒主持其事，选定的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由他们编纂、雕印、校刊书籍自然高出经厂本。

武英殿刻书代表着清代宫廷书籍的刻印水平，大量的优秀典籍由此纂修、刊刻而留存下来，这在当时对全国各地官私出版界、文化理论界起着主导作用。因而武英殿修书处在传播和主导清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武英殿修书处的产生、发展、鼎盛、衰落是与清朝的建立和发展相伴始终的。从修书的内容、刊刷的数量、装潢的规格、装帧的技术，乃至颁奖、惩罚、通行、翻刻等等都是由皇帝钦定。这也反映了清朝时期出版的书籍都与清朝皇帝及其廷臣们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情趣相关，形成了鲜明的殿版书特色。

武英殿刻本亦是中国历代书籍版本中装帧最华贵、版本最精良的书籍，其用料之独特、版式设计之精美、装饰装帧之考究均无可比拟，其鲜明、浓厚的皇宫特色更是独树一帜。以康、雍、乾三朝盛世所刊刻的书最为精美，装订秀雅、刻工精致、纸墨上乘、技艺精湛、装潢考究、雕刻精心。所纂修刊刻的书籍在校勘、编纂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历朝历代，其编纂校勘之书亦是康乾盛世文化学术繁荣的体现，在系统整理、保存古籍和清代文献档案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武英殿修书处的建立

武英殿始建于明初，位于西华门内，其建筑规模如东华门的文华殿，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之相对应。武英殿为前后两重，建筑在一个『工』字形台基上，是一组宫殿群。正门武英门，面阔五间，黄色琉璃瓦歇山顶，坐落在汉白玉栏杆围护的台基上。门前环绕着内金水河，上跨三道石桥，结构精英，气势恢宏。其后部还有规制不凡的敬思殿，两翼是东西配殿凝道殿与煥章殿。这里曾是明初帝王斋居、召见大臣的地方。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康熙以后的二百多年间，这里一直是清朝内务府修书处所在地。清初由于内府刻书事务仍沿用明经厂人员主持，刻书范围也很狭窄，刻书的字体版式均与明经厂本相仿。自康熙初年逐渐开始扩大，特别是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以后，清代宫廷刻书事业迅猛发展起来。

据《光绪会典》记载：『武英殿修书处初为武英殿造办处，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设。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改为武英殿修书处。设管理王大臣，无定额。下面设有兼管官司员二人，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二人，委署主事一人。库掌三人，委署掌库六人，笔帖式四人，分别掌印书籍各项事务。』^①由皇帝特别简派的总理王大臣督办相关事务。武英殿修书处有监造处和校对书籍处两部分组成。监造处专掌监刻书籍，下设有书作、刷印作刻字作等作房。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折配、

装订等职。有拜唐阿十九名、委署领催四名。另设匠役若干，分别为书匠、界划匠、平书匠、刷印匠等，共八十四人，分别负责书籍的写刻、刷印、折配、装帧等事务。校对书籍处负责书籍付印前、后的文字校正工作，下设提调房、校勘房等办事机构。另有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二十多余人，分别由皇帝与翰林院派充。武英殿成为清代内务府管辖之下的一个专门的修、刻书机构，直到清末都是当时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院里的六十三间廊房，正是纂修、刻印、发行书籍，存放书版的场所。康熙初期，武英殿刻书能力尚小，少部分发到南方苏州、扬州一带刻版，然后运回武英殿。在康熙四十年以后，武英殿刻书日益增多，质量好，卷帙宏大，刻印技术全面，这时可以说是武英殿的全盛时期，印刷图书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代。当时在武英殿进行编纂、校刻、辑佚、刻板、印刷以及发行等人员多至上千人，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图书编纂、刻印、出版体系，无论从编刊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历代官私刻书所不及的。康熙年间在这里印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零四十卷。乾隆以后，又编成《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三百余册，共缮写七部。至嘉庆以后各朝，随着国势日趋的衰落，刻书的种数逐渐减少，品质也有所下降。

二、刻印内容及范围

武英殿编纂刻印图书范围广泛，内容涉及经、

史、子、集诸多方面，编纂刊行的书多达千种，凝聚着清一代内廷众臣鸿儒的集体智慧。武英殿刻书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官刻本图书，对清代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历史作用。武英殿刻书数量之大，据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著录为二百九十五种，但实际数字要比这大的多。范围涉及到经学、小学、数学、天文、乐律、文学、艺术、目录、金石、医药等众多门类，这些图书集中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极大的影响并促进了当时的学术发展。

康熙时清中央集权统治已基本确立，国内反清力量大多被平息，统治策略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文治方面，自此开始大规模的编纂刊刻图书及翻译汉文经典。内府图书如圣训、御制诗文，御纂经典、会典、方略等都由武英殿承刻。武英殿修书处设立的初创阶段刻书能力有限，所刻内容多以翰林儒臣们编纂进讲的经史为主。康熙四十年以后，编刊书籍日益增多，除武英殿修书处承刻外，还发交扬州诗局承刻。此时的武英殿刻书质量好，卷次宏大，刻印技术也很全面，并有不少优秀图书问世。所刻各书摆脱了前明经厂本的影响，并日益形成了清内府刻书工致、端庄、典雅的特有风格。

就编纂刻印书籍的内容而言，首先是皇帝本人的作品。清代统治者不但重视藏书、刻书，而且本人也多有研读经史之作，从而也撰写了大量御制作品。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清代皇帝的御制作品数量最多，内容也相当丰富。因此这类圣训、圣制、御制之书，是必须予以刻印的。还有一些书籍，是皇帝受命臣下编修的，因而冠以『钦定』、『奉敕』之名。在武英殿刻本中，这类书籍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特别是康熙之后，御纂、御制、敕修之书更加繁多。如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刻印库勒纳等奉敕撰《日讲四书解义》，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刻高士奇、宋萃奉敕编《圣祖御制诗集》初、二、三集等，是清代官修图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经史类图书占有较大比重。经史相通，用以治世。对前代的经史著作、科学、文学等各类研究成果，均由政府重加刻印颁行。史书可以考鉴古今得失，裨益经济，发展学术，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尤为重要。武英殿刻书中，这类著作占有不小的比重。清代定期编纂、续修有关本朝国史典则之类是武英殿刻印书籍的重点。刻印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前代的政书，对汉族文化传统十分注重。方略、纪略著作，类似于军事史。清代初期武功鼎盛，自康熙朝开始，每于军功告成后开馆纂修，必定编纂成书，记其始末。这种利用档案编刊图书，可以了解清代历次战事用兵始末。乾隆时期武功最盛，殿版书中这类书籍以乾隆朝最多。第三，重视佛教经典的译刻。清王朝十分重视在全国各地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势力，并采取儒、释、道三教兼而并用的政策，佛教经典在传世的殿本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康熙三十九年校刻藏文《甘珠尔》、雍正帝选编了《圆觉经》等二十八种刊行，名曰《二十八经同函》，乾隆帝译刻了汉、满、蒙、藏四体文《楞严经》，校刻了四体合璧的《钦定同文韵统》、《大藏经》等，这些佛教经典的译刻，对发展宗教、联络蒙藏、巩固边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重视自然科学书籍的编刻，这其中主要是天文算法、农田水利、工程技术、舆地测绘等内容，康熙时期任用耶稣会传教士主持的天文历象之有关书籍。如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刻印的《律历渊源》，内收《历象考成》四十二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律吕正义》五卷三部著作。为展示大清帝国的辽阔疆域及山川舆地概貌，加强全国区域管理，康、乾等几位皇帝主持纂修《大清一统志》和《皇舆全图》等。

第五，编纂字书、类书、丛书。清代统治者

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加强民族之间的融和，大量编纂汉族、满族、蒙古族等各民族文字用书，武英殿刊印了各类字典。同时，武英殿刻印的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渊鉴类涵》四百五十卷，康熙五十年《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拾遗》一百一十二卷。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以铜活字排印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曾于《永乐大典》内辑出书籍三百多种，收入到《四库全书》之内。同时用木活字排印了一百三十八种，由武英殿修书处设聚珍局，刻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皇帝认为活字不雅，特赐名《聚珍》，用这套聚珍版活字印行的书籍，称为《聚珍本》。

自顺治以迄宣统的三百六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清内府编修、刻印书籍多达千余种，又据宫博物院图书馆基本上都有收藏，而且大多数是

初印原装本。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刊书籍数量最多，质量亦佳。嘉庆以后各朝，随着国势日趋的衰落，编纂刻书的品种逐渐减少，品质也有所下降。武英殿修书处不仅编辑刊印了清朝编纂的大量书籍，而且还校刻《十三经注疏》、《文献通考》等大量古籍，对传统文化积累与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精良的校勘

武英殿修书处的校勘工作犹为精细，非常审慎，并非一般匠役能力所及。校刻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其职责是校刊、装潢监造处已刻印完成的书籍。凡刊刻书籍之前，先将底本校勘精当后，移送监造处刊刻，刻完后再详加校勘，至于书中内容是否正确，则由原有承办官员校对，字画圈点，再由武英殿修书处核校。为提高工作效率，又设奖赏办法。武英殿有着严格的工作定量，据《清高宗实录》载：“凡缮写汉文，请照明史纲目馆，每员每日一千五百字；缮写清文，请照玉牒馆，每员每日八百五十字；校对数目，请照实录馆，每员每日二十五篇，再查明史馆、三礼馆、国史馆，每书一本，多寡不同，由总裁定期日，各馆于每月初五日以前，将前日纂辑、缮写、校对若干详细造册”，保证了书籍的质量。

从上述方面，看到了工作定量非常严格，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在出现错误的情况下，惩罚起来也是相当严厉的。就是这样强大的奖惩分明的原

则下诞生出一部又一部的不朽之作。更重要的是，皇帝直接的参与，他们不仅亲自过问各项事宜，还委派皇子们充任总裁，或让皇子们直接参加编纂、校勘等工作，如允禄、允塔等等。他们还用了一批学识超群、文才卓越、书法颇佳的翰林学士，及一批刊刻、装潢、绘图等一流的优秀画家及能工巧匠，再加上清朝政府人力、财力上的支持，这也是官刻图书独享的特殊待遇，使得武英殿修书处在出版事业上，在清朝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殿本之所以著称于世与校勘的审慎有很大关系。武英殿修书处校勘审慎的精神，受到世人赞赏。

四、版本特征

武英殿刻书质量相当高，这可从其选用底本之审慎，缮写刊刻之工致，纸张遴选与印刷装订之端庄典雅，校刊之严谨，刷印纸墨与装潢等方面看出，可谓尽善尽美。有专供皇帝阅览的呈览本，又叫御览本、进呈样本。因其装帧的书籍封面均为明黄缎料，故又称『呈览黄册』。供内廷、苑囿陈设用的书籍，亦称为陈设本。供颁赏用书，亦称颁赏本。颁发各省督抚、学政作为样书，令其照式翻刻颁发所属通行。一部书由于读者对象和其用途的不同装帧亦是多样的。

版本特征首先指刻书风格，清代殿本是在明末内府刻书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初期带有明经厂本特点，字体仍是明代末期的风格，正方清新，横细竖粗，结构有些呆板，字大如钱。康熙之后，盛行两种字体，一种

是硬体字，也称仿宋字。另一种是软体字，又称写体。写刻上版多出于名家手笔，字体优美，刻印俱佳。雕刻时以圆秀、工整的楷书上版。还有盛极一时的仿唐欧阳询、元赵孟頫的楷写体，时称『欧字』、『赵字』，统称『软字』。多由江南的刻写高手秉笔操刀，整齐划一，端秀清丽，悦目娱神。康熙六巡江南时，曾考取五十多名写好字的生员供内廷录用。扬州诗局承刻的《全唐诗》为欧字的优秀代表，《佩文韵府》则是其宋字的精品。此后，武英殿修书处刻书渐多，字体也略有变化。宋体硬字由长方趋向正方或扁方形，笔画由瘦劲转向丰满厚重，所刻诸书硬字增多，软字渐少。康熙时期，武英殿刻书中产生出的这批书品好、版本精良的本子，历代被视为是殿本中的精华，这些独具特色的殿本，世人誉为『康版』。这一时期刻印有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二）刻的《清圣祖御制文集》、《御选唐诗》等书，字体都是精心手写楷书上版。而与之相对称的方体字即被称为『硬体字』。特别是集中了一批以朱圭、梅裕风为代表的优良写刻工匠，使得内府刻书完全摆脱了明代经厂本风格的影响，开始形成了清代内府刻书特有的风格。如《古文渊鉴》、《避暑山庄诗图》等都是当时此间内府刻书的优秀代表。康熙以后，软体字又逐渐被仿宋体取代，但这种仿宋体与明正德、嘉靖年间的『仿宋体』已有很大不同，笔力遒劲，结构秀丽。

雍正时期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内府铜活字印书的重要代表，其字镌刻而成，刀法匀净工致。《朱批谕旨》为硬字的杰出作品。《御制避暑

山庄诗》则代表了康乾时期软字的风貌。嘉道以后，修书处雇用江南良匠渐少，来自京师、宛平、山西一带的工匠技术欠佳，所刻诸书精品不多，字体日渐笨拙乏味，缺少生气。道光时雕版字体又以硬体字为主。此时的硬字既刻板又庄重，具有易于雕刻上版的优点，为以后规范化的铅字印刷作了铺垫。

版本特征就其刻书版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心、行款、字数、边栏、界行、墨色、象鼻、鱼尾、书牌、条记、书耳、句读、插图等。武英殿刻书的行款、版式丰富多彩，版框边线鱼尾单双皆有，唯以四周双边，单尾鱼、白口为多。有的边线周围饰以蕃莲纹、回纹、八宝和万字纹花边。书写上亦有对庙号、祖宗、国号、御名等实行单、双、三抬和避讳缺笔的规定。在三抬和避讳上的要求甚为严格。如发现有疵漏轻者罚俸降级，重则革职充军。书前多冠有《御制序》，有御笔，也有大臣代笔，手书上版。序后等处或有『元主人』、『万几余暇』、『稽古右文』、『惟精惟一』等印记。之后有表、职务等。开本多宽大，有皇家气派。亦有小如寸余的袖珍本。武英殿刻本书以其华贵的书品、精良的印版、娟秀的字体而享誉天下，受世人称颂。

五、印刷技术与装帧艺术

(二) 印刷技术

武英殿修书处在印刷技术上全面继承了明以前的所有技术成就，主要采用的是雕版印刷，并有新的提高。尤以铜活字、木活字、多色套印和版画插

图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在中国印刷史和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雕刻印刷是我国的印刷术的最早形式，雕版又叫『镂版』、『刻版』、『刊版』等。但是雕版费工费料，要雕印一部书，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这就促成了活字版的发明。活字有铜活字和木活字，铜活字相对于木活字硬度大，所刻字体更加方正，刀法匀净相对于木活字更加锋利，不失原有的笔意。如雍正时期刻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内府铜活字印书的重要代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四〇年)由当时主持武英殿编印工作的金简编写，由乾隆皇帝批准出版印刷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内府制作木活字印刷的情况。

套版印刷术是在单色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色套印指多色印刷时要求各色版图案印刷时重叠套准在一块版上用不同颜色印刷文字或图像。这种套印古代有两种，一种是每色分别刻版，再逐色套印。另一种是在一版上刷不同颜色一次印刷。多色套印起源于宋代，元代出现书籍的朱墨套印，到了明代有双色乃至四色、五色套印的书籍。而到清代武英殿的套印技术已然发展到顶峰。武英殿采用彩色套印技术刷印的图书很多，尤以朱墨二色套印者居多。从套印本身形式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使段落、字句分明，词意明显，使所要强调的局部醒目，便于阅读。二是色彩斑斓为图书本身增添了光彩，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十分珍贵。各种颜色有不同的用途起不同的作用。一般将正文刻一版黑色，圈点等符号刻一版刷朱色，眉端批注

文字再刻一版刷蓝色或其他颜色等等，按需而定。

几块版合印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版面。在套色印本中，如：《钦定词谱》、《钦定曲谱》、《朱批谕旨》皆是朱墨套印；四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劝善金科》是以朱、墨、黄、绿、蓝五色套印成书。《古文渊鉴》则是以朱、墨、橙、黄、绿五色套印成书。这些都是清代中央官刻图书的精品，它显示了清代中央刻书使用套印技术的极高水平。

印刷离不开纸，清代印书用纸品种很多。最好是开化纸，其次如榜纸、棉纸、连史纸、竹连纸、棉连纸、竹纸、毛边纸、毛太纸等。武英殿和扬州诗局刻书所用纸张墨色极为考究，尤以呈览本、陈设本和欣赏本所用纸为上乘，多用贵重的开化纸和榜纸，因产自浙江省的开化县，而得名。开化纸是清代最名贵的纸张，因为它质地细腻，极其洁白，帘纹不明显，纸虽薄而韧性强，柔润而有韧性。所用墨大都是上等徽墨或御制墨。加上优质的梨枣木板片，平整坚致，不翘不裂精心刷印成书。纸张洁白如玉，字迹墨色漆黑，香满其间，悦目醒神。

(二) 版刻插图

由于古代书版以木质为主，所以插图也称为木刻画。插图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大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殿版画题材广泛，技法丰富，构图严谨，制作精丽，形成了殿版版画艺术特有的风格。殿版画的雕版印刷工艺精湛，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版刻插图可以说是象征着

我国封建社会雕版的最高水准。

康熙五十一年由吴中名匠朱圭、梅裕凤雕刻，为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配画的《避暑山庄三十六图景》雕版技艺纯熟、精练。雍正年间刻印的《圆明园四十景诗》中的插图，融合西洋古典建筑艺术的特点，作者以中西结合的技法，再现了清初宫廷建筑艺术风貌。《八旬万寿盛典》仿效康熙《万寿盛典图》，是一部纪实性题材作品。以及乾隆三十一年刊刻的《南巡盛典》附图一百六十幅，记录了乾隆四次南巡的盛况，构图完美生动，堪称佳品。这些盛大典礼图书中的版画插图，画面开阔，内容丰富，绘刻俱精，为殿版版画中的优秀代表作品。乾隆二十九至三十四年间的一组以战事为题材的铜版画《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十六幅最著名。该图由当时供奉宫廷的西洋画家郎世宁、艾启蒙等人所绘，并由法国宫廷良匠勒巴等人刻铜版刷印，是一组融合中西画法的艺术精品。大型类书、丛书中都附有精美的木版版画图。雍正年间以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附图为木版雕刻，其中山水、地志、名物图录，均请名工雕镌，刻印极为精细，为殿版插图之杰作。又如乾隆时期以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插图形象、逼真，准确地配合文字内容，是一部珍贵的活字版印刷文献，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殿版版画』。

代表了清代版画最高成就的还有《避暑山庄诗图》、《墨法集要》、《耕织图》、《西巡盛典》、《皇朝礼器图式》、《西清古鉴》、《皇清职贡图》、《钦定授时通考》、《大清会典图》等书，是清代版画的优秀作品，对考订殿版版画、研究、欣赏

清代殿版画的艺术成就均有重要的价值。始译于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直至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完成的《清文翻译全藏经》经版文字版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一块，两面刻字，而佛像版画经版达二百多块。从这些书版刻字到佛像版画插图来看都是上乘之作。总之『殿版』版画题材广泛，构图严谨，制作精细，但由于版画内容都是皇帝钦定，绘刻者受到种种局限，所以其作品多以规整见长，而生动活泼不足等缺憾。

（三）装帧艺术

武英殿刻书的装帧艺术是在全面继承了明以前的传统并有新的提高，形成了清代宫廷装帧艺术的鲜明风格。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造办处官员专司一条下『御书处监造官员专司钩摹御笔，镌刻揭印，制墨及硃墨等事』道光二十三年奏明裁撤归并武英殿管理。武英殿修书处监造官员，专司刊刻装潢书籍等事^②。御书处原名文图书馆，顺治朝设于西华门内路南，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改为御书处，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改归武英殿修书处管理，扩大和加强了修书处的业务。由于管理上的加强，加之优越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在装潢上不惜工本，装潢规格都由皇帝决定，出现了不少精品。装帧技艺之高超、选料配色之考究、富丽豪华之程度，都超越了以前各代。清初书籍的装帧，仍因袭了明末内府装帧的遗风，略显粗犷、古拙，以包背装居多，开本宽大。如《资政要览》、《内则衍义》等。康、雍时期，统治者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崇尚典雅、端庄，书籍装帧亦多以此为标准，

技艺精湛，基本摆脱了粗犷、古拙之风，精品很多。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朱批谕旨》、《佩文韵府》等都各有特色，是此时期的精品。乾隆时期的装帧多趋向豪华、繁缛富丽的风格，更趋细致、细腻。《御制诗文集》等书的装潢，都极精良，颇具特色。嘉道以后的书籍装帧远逊于前，精品不多。

武英殿书籍装帧的形式也是丰富多彩，以四眼和六眼包角穿订形式为主。也有包背装、蝴蝶装、经折装、梵夹装等。封面装帧设计庄重、典雅，多以绸、绫等丝制品做书衣。书册之外大都配有各式书套、夹板、盒、匣、箱、柜或单、夹包袱等。以楠木、檀香木等高贵木材制书匣，以避虫蛀，保护书籍不受损坏。仅以书套为例有四合套、如意四合套等，书册和套匣所饰色彩亦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以明黄色最为尊贵，其他的呈览本也多饰此色。镶黄、红色次之，大多用于陈设本。还有磁青、湖色、古色等，多用于文集、杂书等。书册的装裱和套匣的制作精细，端庄典雅，豪华富丽，精美绝伦，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观赏价值。这些殿本书籍的装帧，充分体现了清代统治者的审美情趣和宫廷匠人的精湛技艺，代表了清代宫廷装帧艺术的最高水平和鲜明的特色。

六、殿版及殿本收藏状况

清代宫廷内府出资刊印的图书据统计近千种，多出于武英殿修书处。乾隆时期繁荣强盛达到顶峰，经济空前发展，此时也是殿版书的鼎盛时代。据陶湘的《陶辑书目》载『乾隆一朝，四年诏刻《十三

经》、《二十一史》、十二年刻《明史》、《大清一统治》，次刻《三通》，再次刻《旧唐书》，凡在十二年刊印者，其写刻之工致，纸张之遴选，印刷之色泽，装订之大雅，莫不尽善尽美，斯为极盛时代。』^③如清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二十四史》现存书版二万三千多块。乾隆十二年校刻的《三通》现存书版九千多块。乾隆十年至乾隆三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朱批谕旨》现存书版四千六百多块等等。

从刻印数字上来看，乾隆六十年间共刊刻殿本大约三百多种，几乎占清代殿本总数的一半。殿本刊刻的方法和质量亦不断翻新和提高。如木活字结构疏朗，字形正方生动，笔画宽窄均匀。这时武英殿各种工匠的工艺水平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图书的插图既被称为『殿版画』此时也达到很高程度。

到嘉庆朝，由于战乱不息，白银外流，清政府财政来源濒于枯竭，武英殿刻书也受到影晌。工料来源不足，工匠艺人不断削减，造成刻书质量下降。如嘉庆朝刊刻的书版《八旗通志》、《钦定内务府现行则例》、嘉庆十五年刻的《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现存书版一万二千多块。无论从字体还是版材上看都劣于前朝。

我们在对故宫所藏原刻书版不完全的统计约二十三万块书版的清理、编目当中不难看到，清代官刻书基本集于武英殿修书处，且无论在数量、质量、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官刻书当之无愧的代表。地方官刻无论怎样『广开财源』，也无法与武英殿刻书所代表的中央官刻相比，私刻和坊刻更是相形见绌了。然而，我国在封建社会中，战争连年不断，烽火经久不息，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

惨遭蹂躏，大量珍贵书版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加之自然灾害，诸如火灾、水灾、地震及虫蛀和霉变糟朽，故宫博物院能保存下来如此之巨的书版实属不易。

由于一些人为及自然因素有缺失的，目前所知清内府刻书的收藏，主要分布在中国内地和台北两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位居诸家之首。据台湾的吴哲夫先生著《清代殿本图书》^④统计，该馆共有殿本书五万三千一百九十八册。大都是初印精装的绝佳珍品。在大陆的收藏主要是北京故宫和辽宁图书馆两馆为主。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清内府刻本的发源地，又是此类图书陈设、存藏的集中地，所藏此类图书的数量当属最富。目前所藏的种数和数量居全国之首，这也是故宫图书馆藏书的一大特色。仅《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一书著录的汉、满文等就有六百八十种，三万九千余册。且大多是供皇帝阅览的呈览本和陈设本，纸墨装帧精美绝伦，清代历朝所刻的重要典籍，皆有收藏。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由内府主持编译的图书约有千余种。其中付诸刊印的已逾千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康、雍、乾三朝编刊的数量计有五百余种，占清代内府刊书总数的一半以上。仅乾隆一朝刻书约三百五十余种，居清代诸朝之首。因此，以康、雍、乾三朝为主的内府编刊书籍事业，在整理、校注、辑佚、汇编宋元明古籍和纂修本朝新书方面，都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充分显示了清代官方组织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编书的能力及魄力。

注释：

- ①《光緒會典》卷九十八，《光緒會典事例》卷一〇四五。
- ②《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清咸丰二年武英殿刻本。卷一，第十二页。
- ③陶湘著《陶輯書目》，清代殿版書目。
- ④《清代殿本书》：吴哲夫，见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In the Qing dynasty, all emperor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summarizing their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administration, on which books were compiled and periodically revised. This system was observed by the whole country. Except for the daily records and biographies of emperors and a few others that were not authorized for distribution, the rest was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y the Compilation Office of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Zi originally referred to books prior to the Qin dynasty (before 221 BCE) and in modern times refers broadly to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ompi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ooks was significant. Books 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Palace Editions. Most Qing emperors were highly accomplished in belles-lettres. Palace Editions include many works of emperors themselves, for example books named with royal collections of poetry and essays, imperial compilations, imperial selections, imperial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imperial edicts and commandments. The latter ones were usually compiled by academicians and examined by emperors to reflect the court's principle of "Observing the ancients and encouraging book compilation and reading".

A reprint series is created when two or more books are printed together and renamed. *Collection of Ancient and Present Books* (*Gujin tushu jicheng*), a large-scale collectanea, is abundant in content. Many books, articles, or whole sections were included. Therefore, many rare books of the Song, Yuan (1271-1368) and Ming (1368-1644) dynasties were preserved and transmitted in this way. A classified book is created when the contents of many books are classified and listed together, not unlike a modern encyclopedia. The Qing dynasty saw the height of the compilation of classified books.

Among books of past dynasties, those printed in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were the finest editions with the most luxurious decorations. They were first-class works with unique materials, elegant format designs and quality bindings, and stand out with marked and strong imperial features.

PREFACE

When the Manchu established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rulers unified China via military accomplishments but depended upon literary achievements to shine through the ages.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Qing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a full bloom is the stress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evidence is in the va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produced by the Qing court.

After the Qing dynasty was settled in Beijing, the precious books and records of the Ming court were kept intact by the Qing court, which was starting to set up a central printing institution. Early in the Kangxi period (1662-1722), the Compilation Office of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Wuying dian*)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to compile, print, bind and embellish books. Noted for their great quantity, high quality and fine craftsmanship, the books prin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fice were close to perfection. As the Office was located in the imperial palace, the books printed there were known as "Palace Editions". The Palace Museum has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Palace Editions. These books represent the high printing level of Qing imperial publications. A great number of the excellent books that were compiled and printed there served as a guide for official and private publishing as well as for literary circles. Therefore, the Compilation Office played a vital role in spreading and guiding social thought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the emperor himself who decided the books' content, print run, binding format, decorative techniques, distribution, reprints, and even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for compilers and the woodblock carvers. This situation reflects the fact that Qing publications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ideology and taste of the Qing emperor and his courtier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shing and ideology became a marked feature of Palace Editions.

This catalogu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in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through a careful selection of Palace Editions in four section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ategories of book collecting: "Classics", "Histo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Belles-lettres", and "Collectanea." Classics and histori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as they served as guides for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Kangxi reig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Five Classics and the Four Books" from before the Qin dynasty (221-206 BCE) and the works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scholars Cheng Yi and Zhu Xi and Ming dynasty were collated, printed and studied without interruption. Shortly after his enthronement, the Kangxi Emperor adopted the custom of previous dynasties and began the practice of daily discussion of classics. He ordered his ministers to assemble the best essays and to summarize them into books for public release.